

目录

总序	王克非	ix
前言	黄焰结	xiv

第一章 翻译史研究的体系与范畴 1

1.1 引言	1
1.2 翻译史研究的知识体系	3
1.2.1 翻译史与翻译史研究	3
1.2.2 翻译史研究的(亚)学科性质	5
1.2.3 翻译史研究的认知范畴	8
1.3 翻译史研究的三个层次	13
1.3.1 翻译史实践	14
1.3.2 翻译史论	16
1.3.3 翻译史学研究	18
1.4 翻译史研究的两种类型:内史与外史	21
1.5 小结	22

第二章 翻译史研究的历史概述 25

2.1 引言	25
2.2 西方翻译史学简史	26
2.2.1 发端至 20 世纪 70 年代:以翻译史实践为重心的 传统翻译史学	26

2.2.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翻译史论为重心的现代翻译史学	31
2.2.3	西方翻译史学理论的历史发展	39
2.3	中国翻译史学简史	44
2.3.1	发端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翻译史实践为重心的传统翻译史学	45
2.3.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翻译史实践到翻译史论的范式转变	53
2.4	小结	60
第三章 翻译史料研究法		62
<hr/>		
3.1	引言	62
3.2	核心概念	63
3.2.1	翻译	63
3.2.2	重译、复译与转译	65
3.2.3	“译入”与“译出”	67
3.3	翻译史料	68
3.3.1	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	69
3.3.2	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	70
3.3.3	翻译文本、副文本、外文本与元文本史料	77
3.4	翻译史料的发掘与运用	78
3.4.1	翻译史料搜集与拓展的渠道	79
3.4.2	翻译史料梳理的方式	82
3.4.3	翻译史料的鉴别	84
3.4.4	翻译史料的整理与运用	87
3.5	小结	92

第四章 跨学科翻译史研究法

93

4.1 引言	93
4.2 研究的基本要素与问题	94
4.3 研究的理论视角、思路与步骤	96
4.3.1 研究的理论视角	96
4.3.2 研究思路与步骤	98
4.4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100
4.4.1 翻译史研究中的考证方法	101
4.4.2 翻译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方法	103
4.4.3 翻译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	105
4.4.4 翻译史研究中的历史比较方法	113
4.4.5 翻译史研究中的实证研究	116
4.5 小结	122

第五章 翻译史的书写

124

5.1 引言	124
5.2 翻译史书写概述	125
5.2.1 多元化的翻译史书写格局	125
5.2.2 会通的翻译史书写	130
5.3 后现代史学观照下的翻译史书写	132
5.3.1 浪漫型叙述模式	132
5.3.2 喜剧型叙述模式	134
5.3.3 悲剧型叙述模式	134
5.3.4 讽刺型叙述模式	135

5.4	翻译文化史学观照下的翻译史书写	137
5.4.1	翻译文化史学理论简述	137
5.4.2	文化隐喻式书写模式	138
5.5	翻译史书写的重要问题	149
5.5.1	翻译史书写的文学性	149
5.5.2	翻译史书写的意识形态性	151
5.5.3	翻译史书写的虚构性	152
5.6	小结	155
第六章 重写翻译史的思考		157
<hr/>		
6.1	引言	157
6.2	翻译史即文化史	157
6.2.1	翻译的文化属性	158
6.2.2	翻译研究的历史关怀	159
6.2.3	翻译史的文化史属性	159
6.3	重写翻译史的考量	161
6.3.1	重写翻译史的原因	161
6.3.2	重写翻译史的再认识	167
6.4	翻译史研究的发展前景	169
6.4.1	以双语 / 多语文化为主体的翻译史书写	170
6.4.2	“绿意渐浮”的新变化	171
6.5	小结	184
参考文献		186
推荐文献		203
索引		205

总序

翻译是沟通不同语言文化的中介和桥梁；翻译也是不同语言容器里文化内容的交换。人类的进步、文化的繁荣皆与翻译密不可分，怎么估量它的意义也不为过。然而，翻译的价值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对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也远远不够。

季羨林先生曾从事非常重要的文化翻译工作，对翻译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极高的评价。他谈及五千年中华文明虽历经波折却始终绵延不绝、蓬勃发展的原因时，曾这样说：

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一语道尽翻译对中华文化的演进、对人类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巨大作用。

翻译活动最基本的三个要素是语言、文化和译者。语言离不开民族、社会、文化，并浸润其中；双语文本转换离不开执行转换的人，即译者；

译者则必定是因某种语言文化滋润而生又受到另一种语言文化“增补”的人。于是，翻译成为语言文化间的信使。在翻译三要素中，最容易看见也最容易理解的是语言这个要素。因此，从古至今对翻译的关注都从语言开始，都跟语言分不开。这既是说，若没有语言，翻译就无所依附；同时又是说，若没有千差万别的语言，也就不需要翻译。因此翻译与语言有天然的联系。

但我们说翻译离不开语言时，并不意味着翻译是语言的附庸，或语言可以完全离开翻译。一方面，翻译与语言几乎是共生的，没有脱离语言的翻译。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到，若无翻译，语言的交流、认知和传承等重要功能就难以充分展开；没有翻译，人们只能与来自本地域的人而不能与来自其他地域的人深入交流和沟通；没有翻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也受到局限，不能同其他地域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分享经验和探讨问题；没有翻译，知识的传承范围有限，受益范围有限。Casagrande (1954: 338) 在考察翻译目的时提出了“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在翻译文化”的观点。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一是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二是翻译活动的动因及其影响背后都有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三是翻译的难点有时并不单在语言的差异上，而是在文化的距离上。

由此可见，翻译的中介性是双重的，它不但表现为传统认识上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这样直接的中介性，还有另一层意义上的中介性，即译文间接地对所译入的母语及其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有这些都表明，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特殊的人类思维与人类交往活动。

对于翻译这样重要而又复杂的活动，千百年来人们抱有经久不衰的好奇心和探究心：

从思维层面尝试阐释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理论翻译研究的着力思考点；

从实践层面努力解决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翻译文化研究上下求索的要点；

从各类语料库驱动的视角考察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趣所在；

从古至今频繁进行的口译活动，则是探究隐秘心理过程的关键实验台。

这套“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即分理论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翻译文化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以及口译研究五个板块，对翻译问题给予了全方位的关注。

“理论翻译研究系列”梳理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哲学和文化层面总结概括翻译学方法论在中西方的发展历史及特点，并对翻译研究中起步较晚、发展较快的新兴研究领域作了重点介绍。本系列首批计划推出《国外翻译理论发展研究》《翻译过程研究：理论、方法、问题》《译学方法论研究》《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等四部图书，其特点如下：(1)纵横阐述。这些图书既从历时的角度描述了翻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历程，还对当前的主要观点和流派，特别是对最新的认知心理过程研究模式作了细致的分辨和论述。(2)中外互鉴。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理论作了系统归纳，透视出中外文化背后哲学思想和理念的异同。(3)点面结合。既有对理论和流派的全面梳理，又兼顾对研究热点和研究走向的前瞻式分析。

“应用翻译研究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不仅有致力于翻译教学方法和实施效果探讨的《翻译教学研究》，以及以翻译教学应用为导向的、以实证型研究方法为主的《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和《翻译能力研究》，还包括探讨翻译技巧、翻译策略在具体领域(如科技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等)中如何应用的《实务翻译研究》。此外，随着计算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翻译技术发展迅速，成为现代翻译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翻译技术研究》也是本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之一。

“翻译文化研究系列”重在探讨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作用。翻译文化研究是在当下学科疆域迅速扩大的背景下,指导我们在译学领域如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展开的重要译学课题之一。这个系列包括中国和西方的翻译文学、文化史研究,中国典籍外译研究,以及中文小说的英译研究,这些都是我国近十年来翻译研究发展最为显著的领域。此外,该系列还有专著对翻译史研究方法加以阐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类双语语料库的创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平行语料或类比语料进行翻译研究。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受到研究者青睐,研究范围涉及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语体变化、语言对比、翻译规范、翻译教学、语言接触以及相应的双语语料库技术等等。“语料库翻译研究系列”首批策划出版的选题包括以下六部:《语料库翻译学理论研究》《双语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语料库文体统计学方法与应用》《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翻译研究》《基于双语语料库的应用翻译研究》和《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这些选题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兼顾文学文本与应用文本翻译,将数据检索与统计方法运用到语言和翻译研究当中,实现了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形式和意义、文体和诗学分析的有机结合,代表了大数据时代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口译研究十多年来发展迅速,摆脱了过去经验式的探讨,开始运用现代技术开展关于口译(包括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等)认知过程各类实证研究。“口译研究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包括从学科建构视角梳理口译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方法路径、提出整体性口译研究框架的《口译理论研究》,致力于口译教学方法应用和实施效果探讨的《口译教学研究》,以及系统探讨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的《语料库口译研究》。

以上也是近二十年来国际译学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当然,丛书也

有未顾及的一些问题，如翻译叙事研究、机器翻译、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弥补。我们期待通过这套丛书，与读者共同探讨翻译研究的种种重要问题，梳理相关研究的国内外进展，评介主要的理论、方法、流派，判断和设计研究课题，分析今后的发展趋势，并推介重要的参考文献。希望读者朋友，特别是初涉翻译研究的青年研究者能够开卷受益，拓宽视野。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年11月

参考文献

季羨林，2007，《季羨林谈翻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Casagrande, J. B. 1954. The ends of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0: 335-340.

前言

人类的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翻译传统悠久深厚，留存下来的翻译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相较于古已有之的翻译研究，中外翻译史学传统的诞生则要晚得多——中国对翻译活动的历史考察大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翻译史研究大致可上溯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长期以来，中西方的传统翻译史研究都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直到20世纪中叶，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翻译学学科地位的逐步确立，翻译与历史和文化的互文关系越来越深入，再加之历史学的深远影响，翻译史研究才日渐兴盛。观察翻译史研究者队伍可发现，其学术背景涉及翻译学、外语研究、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社会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甚至还有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概言之，当下的翻译史研究不仅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而且发展前景也一片光明，甚而出现了构建翻译史亚学科乃至独立学科地位的呼声。

然而，在翻译史研究繁荣的背后，我们亦观察到了其所存在的不足。确切地说，学界对翻译史研究本身，其理论话语、研究方法以及翻译史书写等问题，还缺乏系统的梳理与探讨——近年来，中西方虽有一些学者有志于此，但其成果多为零星的散论，与翻译史研究当前的繁荣景象不甚相称。有鉴于此，本书致力于探索翻译史学理论和翻译史书写模式，旨在

使翻译史研究方法走向理论化与系统化。全书具体章节架构如下：

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第一章旨在厘清翻译史研究(翻译史学)之“名”——“主体对客观翻译史的系统认识”，明确其学科性质——“以翻译为对象的专门史，也是跨历史学和翻译学的学科史”，廓清其认识范畴——涵盖翻译史实践、翻译史论和翻译史学研究三个层次。在此基础上，第二章对中西方翻译史研究数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评述，可谓中西方翻译史学简史。整体来看，第一、二章是对翻译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历史梳理，相当于全书的第一部分，旨在总结过往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为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张目。

第二部分以清代桐城派标举的“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的论学论文术语为研究思路，分三章详细探讨翻译史研究的治学之道。本书中的“考据”是指发掘新史料、翔实地占有史料和辨析史料。第三章针对翻译史研究的这项基础工作，详论翻译史料的类型、性质与功能，探讨史料搜集、拓展、鉴别、整理和运用的方法与途径，努力实现翻译史研究之“真”。“义理”是指运用适切的理论和方法对史料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第四章针对翻译史研究的关键工作，切入研究的理论视角，详论跨学科的翻译史研究方法，追求翻译史研究之“善”(亦即由史料之“真”引发学术良知，从而作出对研究有益且适当的行为)，努力恢复翻译史的面貌。所谓“辞章”，就是通过“妙手著文章”，将研究成果按一定模式书写成史学作品。第五章针对翻译史研究的收官工作，详论翻译史研究的内容整合与书写模式，尽力创造学术精品，寻求翻译史研究之“美”。

第三部分即本书的第六章，相当于全书的结语。该章针对翻译史的文化史属性，深入思考重写翻译史的原因，并展望翻译史研究的发展前景。这样的结尾旨在建构翻译叙事与历史叙事相统一的翻译文化史研究范式，进一步凸显翻译史研究严密合理的思理逻辑及其文化意义，从而有效地保证翻译史书写在文学性与历史性、主体性与客观性、多元性与一致性上的统一。

概而言之，本书首先在确定翻译史研究名与实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和考量中西方翻译史的研究脉络、发展趋势与前沿成果；进而逐步探讨翻译史料的搜集、拓展、鉴别、整理和运用，跨学科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以及翻译史书写模式，并佐以案例分析和理论话语阐述；最后提出笔者自己的思考判断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和建议。总的来讲，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深入了解翻译史研究领域，掌握系统的翻译史研究方法，明确相关话题应该从何处着眼、如何入手，以对读者起到研究导论和方法论指引的作用，使之成为翻译史研究的常备参考书。

本书具名《翻译史研究方法》，意在向著名的翻译史研究学者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的英文著作致敬。皮姆的*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的中文书名最早由王克非教授译作《翻译史研究方法》，其后固定为该书的中文名称。多年前笔者就希望将这部开翻译史研究之先河的名作翻译成中文，但苦于多种原因，一直未有行动。当然，致敬同行绝非重复前辈之作，而应在借鉴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阐发，本书的核心思路在于尝试以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来探索翻译史研究。这也是本书的英文名称翻译作*Studies on Translation History*，有别于皮姆的*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的原因。此外，鉴于作者的学术背景和潜在的中文读者，尽管本书的翻译史研究以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史研究为对象，且尽量考察翻译史研究的共性特征，本书仍将主要以中国翻译史现象为实例来探讨相关问题(同理，皮姆也多以西方历史上的翻译现象为研究对象)。

笔者从事翻译史研究多年，2010年曾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规划基金项目)“翻译史学理论与方法——基于中西方翻译史研究的批判性考察”(已于2014年结项)。本书是该项目结项之后的后续研究成果。在此，我要感谢“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总主编王克非教授的信任和指导。四年前，正是受王老师的委托，我才又重新踏上翻译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之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还承蒙其多次给予指导和建议，予我以深深启迪。本书汲取了他丰富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如果没有老师

的鼓励和指导，不可能有此书的写作设想，更不可能完成此书的写作。

我还要感谢邹振环、穆雷、欧阳东峰、郑锦怀、岳峰、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诸教授，他们之中有些人我还从未谋面，仅通过阅读相识，本书的写作亦深受其启发和影响，部分章节记录了他们的学术思想，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我从他们那里获益良多，因此就我而言，文中的致谢还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深深谢意。

在本书的长期酝酿过程中，很幸运有很多同事和朋友给予我指导和支持。他们是安徽工程大学的刘聪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的张德让教授与刘和文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的黄立波教授与刘晓峰博士、河北工业大学的孙乃荣博士以及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凯博士。对有着与我相同或相异的学术背景而他们，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能够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本书，我深感荣幸。项目负责人董一书女士对我无休止的延期交稿予以了宽容和理解，并抱以极大的耐心；她与编辑蔡天航女士精心审校和修订了书稿。感谢她们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劳。

翻译史学理论与方法是当下翻译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本书尝试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既是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缺，亦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翻译史书写。如书中所言，翻译史书写“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书写格局，但对于每一位书写者来说，他们书写的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单一的历史”。因此，本书仅是笔者的一家之言，限于笔者的学识和学术能力，难免有疏漏或不当之处，恳请广大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黄焰结
安徽师范大学
2021年10月

翻译史研究的体系与范畴

1.1 引言

在古希腊知识体系中，历史和诗歌、音乐、舞蹈都属于文艺范畴。据希腊神话记载，主神宙斯（Zeus）与记忆女神穆涅摩西涅（Mnemosyne）有九个女儿，亦即九个缪斯（Muses），她们分别掌管文艺的九个领域，其中掌管历史的女神手执一幅卷轴，被称作克丽奥（Clio或Kleio）。“历史女神克丽奥的大厦的确很宽敞”（Brinton 1964: 310），包括翻译等“许多不同的住处”，只是各个住处的“设计和摆设风格迥然有异”¹。历史学的多样性显而易见，而克丽奥眼中的翻译则凸显了翻译史的存在。

由此，翻译史研究自16世纪浮出历史地表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终于在20世纪后期于克丽奥宽敞的大厦里觅得了一方“住处”。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翻译史研究渐渐兴盛起来，实践史、理论（思想）史、史料集、翻译家传等各种具体翻译史以及翻译史学研究等方面的著述相继出现（Bastin & Bandia 2006: 9-10; Pym 1998/2007:

1 引文语出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克莱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于1963年12月29日在费城召开的历史年会上的发言，原文是：“Clio’s house is indeed a spacious one, with many different dwelling places, planned and furnished in many different styles.”。

12), 翻译史研究呈现出一片光明的前景。就中国学界而言, 翻译史在翻译研究论著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至1982年的3.7%上升到了2002年至2007年的5.9%(许钧、穆雷 2009a: 79)¹; 在中国出版的翻译史著作从1979年至1983年的寥寥10余部突涨到了2009年至2013年的190部, 30余年出版总数不下540部(黄焰结等 2016: 39); 近20年(2001—2019)发表的翻译史研究论文则高达7,079篇, 自2005年起每年发文数量都在200篇以上, 2014年甚至高达603篇²; 就博士论文而言, 翻译史研究已发展成为翻译学中第二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相关博士论文占翻译研究博士论文总数(686篇)的33.5%, 仅比排第一名的翻译理论(占35%)少1.5个百分点(穆雷、邹兵 2014: 15); 截至2016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史研究项目立项超过100项, 成为占比最大的翻译研究类国家社科项目(穆雷、王莹 2018: vii)。由是可以说, 翻译史研究再也不是50年前霍姆斯(Holmes 2000: 185)笔下那个无足轻重的“灰姑娘”³, 而已发展成为翻译学中一个独立、完整的研究领域(Pym 1998/2007: 4), 甚至成为一个“步入青年期”(Bastin & Bandia 2006: 11)的独立学科了。

翻译史既是以前翻译为对象的专门史, 也是跨历史学和翻译学的学科史。翻译史的知识体系构建了翻译史研究的学科体系。那么, 何为翻译史与翻译史研究? 翻译史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学科性质, 与历史学和翻译学有

1 该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包括30年(1978—2007)来中国内地主要外语研究期刊上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 国内机构出版的翻译研究著作, 以及全国重要的翻译理论研讨会成果等。

2 该数据通过中国期刊网“远见搜索”(http://yuanjian.cnki.net/Search/Result)对“翻译史”关键词(近20年)进行学术研究指数分析所得, 2020年4月25日读取。

3 1972年8月, 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詹姆斯·斯特拉顿·霍姆斯(James Stratton Holmes)在大会的“翻译组”(the Translation Section)宣读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英文会议论文, 简要指出翻译史研究归属于翻译学“理论研究”之下“分别研究”的“时间侧重”(time-restricted)板块。该论文及其荷兰语译文随后陆续发表在一些(会议)论文集和学术刊物上, 期间有些许文字和格式上的修订, 后又收录于荷兰罗德彼出版社(Rodopi)1988年出版的霍姆斯个人的论文集《译稿杀青! 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中(参阅Holmes 1988/2007: 66-80)。

什么样的关联？翻译史研究又由哪些层次构成，各个层次分别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本章从翻译史概念出发，尝试探讨上述问题，以勾勒翻译史研究的知识体系与学科范畴。

1.2 翻译史研究的知识体系

欲探讨翻译史研究的知识体系与学科范畴，必得先从其“名”开始。名即名称、名头、名义、名分，只有从辨名出发，厘清概念，才能透过翻译史中的人、事、物等具体现象，落实到研究之实际与实质。

1.2.1 翻译史与翻译史研究

一般说来，历史(history)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过去的思想或曾发生的事件和活动；二是指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解，亦即历史学(Dray 1993: 1; 何兆武 2009: 4)。基于此，作为历史分支的翻译史(translation history)包括如下两个层面：(1)人类过去的翻译经历；(2)对人类过去的翻译经历的描述与研究。前者是历史上有关翻译的事件和现象，是描述和研究的对象与前提，可以称为“翻译的历史”¹；后者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史研究”，既包括撰写历史的活动，也包括对翻译史这门学问发展历程的研究，亦可称为“翻译史学”，即英语中的Histo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或广义的Translation Historiography²。例如，在句子“这部翻译史没有很好地处理中国翻译史的分期问题”中，前一个“翻译史”指翻译史研究的成果，而后一个“翻译史”则指历史上的

1 英文的history和中文的“历史”一样，具体和抽象的词义都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只能靠语境区分。而在德文中，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历史为Geschichte，而具体的历史研究则为Historie。

2 在英文中，historiography传统上指“关于历史书写方法的研究”，后来其意义扩展为“人们书写历史的活动以及对历史学问的研究”，与history的第二层意义重叠。西方有些学者(如Milton 2001)为了凸显“翻译史研究”这层意思，偶尔也采用Histo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术语。

翻译事件与翻译现象。换言之，“翻译的历史”是抽象的客观历史存在，而“翻译史研究”则是对人类翻译历史的认知与探索，最终会产生具体的学说、著述，乃至构建翻译史学科或知识体系。

因为翻译史的这两层意思，人们出于习惯或方便等原因，往往用翻译史来指代翻译史研究。西方著名翻译史研究学者皮姆 (Pym 1998/2007: 5) 就宁愿用 Translation History 来代替 Translation Historiography¹，因为他觉得后者表述“欠佳” (less pretty)。实际上，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翻译史与翻译史研究的主客体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一切人类知识都属于“认识”的范畴，翻译史研究也不例外，是认识的科学。从哲学上看，认识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主体指“历史行动中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 1979: 237)，即进行实践、认识客体的人本身；客体与主体相对，是主体认识活动所指向的事物 (孙书南 1987: 27)。就抽象的翻译史而言，主体是从事翻译的人——译者，或曰翻译家；客体则是源语文本 (原作) 以及由此产生的目标语文本 (译作)。由此一来，所谓翻译史，就是指人类从事翻译的历史，即历史上翻译客体的总和。就具体的翻译史而言，翻译史研究的主体则是翻译史研究人员，或曰翻译史家；客体就是客观存在的翻译史本身，不仅包括翻译史的主体 (译者) 和客体 (原作和译作)，还包括由译者拓展开来的翻译语言与风格、翻译方法与策略、翻译思想、翻译流派、翻译机构，以及与翻译作品相关联的翻译接受者和媒介者，乃至翻译史研究本身。简言之，翻译史研究就是主体对客观翻译史的系统认识。笔者将翻译史与翻译史研究的区别归纳于表 1.1 中。

1 土耳其学者 Şehnaz T. Gürçağlar (2013: 132) 在为《劳特利奇翻译研究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撰写“翻译史”词条时，也声言以 history 指代 historiography。此外，就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很多学者也这般命名其著作，如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 (James Harvey Robinson) 1912 年出版的反传统史学的重要代表作就以 *The New History* 作为书名，除 1920 年北大翻印该书时将书名译为《新历史》外，中国史学界一直采用《新史学》这一中译名 (李孝迁 2007)。

表 1.1 翻译史与翻译史研究的区别

类别	客体	主体
翻译史	源语文本（原作）与目标语文本（译作）	译者 / 翻译家
翻译史研究	客观存在的翻译史本身（包括译者、原作与译作等）	翻译史研究人员 / 翻译史家

所以说，如果忽视了翻译史与翻译史研究的区别，就很容易造成误解和混乱，给研究带来不便。有些学者就比较严谨，除使用“翻译史”或与其相近的术语外，还会采用与研究相关的字眼对其进行修饰，如王佐良（1987：3）和王克非（1997：3）分别使用的“译史研究”与“翻译历史的研究”，部分西方学者会采用Histo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¹这一术语。此外，皮姆的著作*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在国内首译的书名便是《翻译史研究方法》（柯飞 2002：31）。

1.2.2 翻译史研究的（亚）学科性质

皮姆（Pym 1998/2007：199-201）将翻译史研究定位为“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认为其与比较文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定位扩大了翻译史研究的疆域，包容了一切可研究的内容，但对其性质的泛化描写却使翻译史研究处于“无根”的尴尬境地，使其主体学科淹没在宏博的学科交叉之中。翻译史研究是交叉学科这个命题不假，但既然它是对客观翻译史的系统认识，那么确切地讲，它的主体构建学科应该是翻译学和历史学。

首先，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基础的基础”，即翻译学科三个最基本的支撑点之一²（谢天振 2013：5）。尽管翻译史研究与翻译学的主体不

1 参阅本书1.2.1小节脚注2的内容。尽管有不少西方学者采用Translation Historiography这一术语，但鉴于historiography一词的多义性，一些研究者未必以此来指称广义的翻译史研究。

2 翻译学其他两个最基本的支撑点是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

同(翻译学的主体是翻译研究人员),但它们所面对的客体都是翻译。任何客体都具有一定的空间形式和时间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场域和产生、发展及最终消亡的历史。换言之,任何客体总在一定的时空下运动,翻译客体也是如此。主体对翻译客体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的认识差异,造就了翻译史研究与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差异。一般而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都主要是主体对客体的空间性认识的科学,唯历史学有所不同,虽然历史学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它归根结底更倾向于主体对客体的时间性认识的科学(范钟秀等 2011: 23)。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史学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953: 27)就曾指出,历史(学)乃是一门时间中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en in time)。就翻译史研究而言,它反映的显然是主体对翻译客体在时间上的认识;而且近年来,翻译史研究确实也在贯彻“以人为本”(Pym 1998/2007)的研究思想,翻译史的主体——译者——成了翻译史研究客体中最重要的要素。相较而言,翻译学则是反映主体对翻译客体的空间性认识的科学。因此,从学科性质来考虑,翻译史研究应属于历史学范畴;加之它研究的又是翻译这一特定现象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所以它应该是一门专门史。

其次,当我们说某学科是一门时间性很强的学科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要在其中把握空间概念。只有把这一学科所涉及的话题、内容或知识限定在一个空间内,才能对其进行讨论,因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下进行的。时间性强的学科也需要空间的场域,也就是要寻找一个认识历史的落脚点。翻译史研究的最佳空间落脚点自然是翻译学,因为二者所面对的客体都是翻译。因此,翻译史研究反映了主体把翻译客体限定在翻译学空间内对时间性的认识。这样看来,翻译史研究既需要历史时间的辩证与想象,也少不了发挥翻译学空间的想象力。今天翻译史研究的繁荣应该说是历史时间和翻译学空间想象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说明,翻译史研究的学科性质是以翻译为对象、跨历

史学与翻译学的专门史。不过，翻译史研究的空间认识虽然以翻译学为基点，但又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翻译学，而应该使翻译学空间与文学、语言学、宗教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空间相融合，从而构成一个多元、异质的动态空间。唯有如此，人们对翻译客体的历史认识才不至于显得狭隘与偏颇，才会更加全面与合理。这也是笔者对于翻译史研究作为跨学科研究的看法。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门有空间性倾向的学科，翻译学也需要时间上的辩证和想象力。福柯说，时间是一个充满辩证和想象力的概念，而空间往往是僵硬的、固定的、没有任何生气的概念(转引自范钟秀等 2011: 23)。因此，若缺乏翻译史研究，翻译学将会僵化，可见翻译史研究(包括翻译学史)之于翻译学的重要性。毕竟，翻译史的构建是现代翻译理论的头等任务(Berman 1984/1992: 1)，也是翻译学建设的两项具体工作之一(董秋斯 1951/1984: 543)。

再次，翻译史是知识复兴之地，可以为深度的跨文化理解和真正的全球意识¹提供合适的空间。不过，从空间性来看，翻译史研究存在西方(中心)和非西方(边缘)之别。我们知道，空间是有中心和边缘的，而且二者在知识上存在差异。在今天的翻译史研究领域，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翻译话语与非西方边缘翻译话语的对立、协商或相互迁移过渡，就是空间方位与知识的逆势运行。为此，乔治·L·巴斯坦(Georges L. Bastin)和保罗·班迪亚(Paul Bandia)(2006)等学者立足拉美，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翻译史研究，呼唤非西方话语的声音。他们的呼吁得到了孔慧怡等中外学者(包括主流的西方学者)(如Bandia

1 如今虽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但不同文化之间仍存在齟齬和障碍，因沟通交流不到位而导致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可这些文化冲突被全球化的表象所掩盖，甚至全球化“虚假地披上了真实的外衣”(庾虎 2014: 107)。具有文化交流史性质的翻译史有望助力实现“深度的跨文化理解和真正的全球意识”，去除全球化表象的虚假性，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但就当前的翻译史学术研究而言，具有全球史意识的翻译史书写还处于尝试与探索之中(详情参阅本书6.4.2.1小节)，因而笔者亦期望能早日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翻译史面世。

2008; Hermans 2006; Hung & Wakabayashi 2005; Ricci & Van der Putten 2011) 的响应, 这些学者努力发掘与弘扬亚非翻译传统, 突出民族翻译传统之间跨文化的联系, 以重构真正全球意识上的翻译史研究。

1.2.3 翻译史研究的认知范畴

方梦之(2004: 348)将翻译史定义为“记叙人类社会翻译活动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的历史”。在此基础上的翻译史研究包括翻译实践史和翻译理论史两部分, 亦即刘宓庆(2005: 19)所言的翻译发展史和翻译理论史。显然, 前述划分方法对翻译史的认知范畴比较狭窄。王克非(1997: 2-3)则区分了翻译史研究与翻译文化史研究: 前者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 重点描述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翻译流派和翻译事件等; 后者则不止于此, 重在研究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与影响以及翻译在文化史上的作用等。

环顾西方, 皮姆(Pym 1998/2007: 5)认为, 翻译史研究应包括“翻译考古”(translation archaeology)、“历史批评”(historical criticism)和“解释”(explanation)三部分。“翻译考古”描述翻译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和译者等问题, 与朱迪斯·伍兹沃斯(Judith Woodsworth)(1995: 12)和沈安德(James St. André)(2009: 134)所言的翻译实践史(history of translation practice)相对应。“历史批评”指的是当时的人对历史上翻译活动的作用所作的评论¹, 与伍兹沃斯的翻译理论史(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或沈安德的翻译理论与批评史(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相对应。可见, 这两部分是对历史上翻译现象和翻译批评(或思想)的挖掘和记录, 既与王克非的翻译史研究相对应, 又等同于何塞·兰伯特(José Lambert)(1993: 9)所说的“史料的综合展示”(synthetic display of historical material), 其研究成果包括翻译史

1 相应地, 融入当代价值观的今人评论则是非历史批评(non-historical criticism)。

料集 (collections of texts put in a historical order) 和各种各样有关翻译家和翻译现象的“具体史”(histories on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s)。此外,对于“解释”部分,皮姆认为应该用一定的理论话语来阐释翻译史实的成因,对应于伍兹沃斯(Woodsworth 1995: 14)的“以论带史”(different approaches to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与兰伯特(Lambert 1993: 9, 20)的“史论结合”——即以论带史或以史带论(the discourse upon historical data, or the argumentation on the historical object),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研究也属于这种历史话语阐释范畴。上述学者们关于翻译史研究范畴的观点可简单归纳为表1.2:

表 1.2 中西方学者眼中的翻译史研究范畴

学者姓名	对翻译史研究范畴的划分		
方梦之	记叙人类社会翻译活动的历史	记叙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的历史	
刘宓庆	翻译发展史	翻译理论史	
王克非	翻译史		翻译文化史
皮姆	翻译考古	历史批评	解释
伍兹沃斯	翻译实践史	翻译理论史	以论带史
沈安德	翻译实践史	翻译理论与批评史	
兰伯特 ¹	翻译史料的综合展示——翻译史料集和各种“具体史”		史论结合

综上所述,上述学者均认为翻译史研究是对客观翻译史的记录、描述与解释。兰伯特提出的整合翻译实践史和翻译理论史、书写各种“具体史”的想法既比较合理,也容易操作,只可惜未进一步展开。不过,这样一个翻译史研究体系还不够完整、系统。按照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利

1 需注意的是,兰伯特(Lambert 1993: 9)以history来指代“翻译史料的综合展示”,以historiography来指代“史论结合”,以示二者的区别。

芬·德赫斯特 (Lieven D'hulst) (2010: 397-398) 对历史研究的划分, 这一体系还缺乏对翻译史研究理论及翻译史研究自身相关问题的探讨。德赫斯特认为历史研究有三个层次, 即历史描述 (history)、历史阐释 (historiography) 和元历史研究 (metahistoriography)。该历史研究框架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借鉴。

如 1.2.1 小节所述, 翻译史研究的客体具体包括: (1) 翻译史的主客体, 即译者、翻译作品、翻译方法、翻译思想等; (2) 翻译作品的接受者或读者; (3) 翻译的媒介, 即翻译在传播过程中被介入的因素; (4) 翻译史的学科史 (黄焰结 2011: 52)。按照德赫斯特所勾勒的历史研究范畴, 翻译史研究这四个横向联系的客体又覆盖三个纵向发展的层次, 即翻译史实践、翻译史论和翻译史学研究。翻译史实践是对人类社会翻译活动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的历史描述, 研究对象是抽象的、客观存在的“翻译的历史”; 翻译史论指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而进行的对翻译史料的系统分析, 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认识或理解, 其直接研究对象是翻译史实践, 间接对象是客观抽象的翻译史。翻译史实践和翻译史论可统一称为翻译史学实践。翻译史学研究则是对翻译史学实践的理解或诠释, 即对翻译史的史料、理论话语、研究方法、论证结构、叙述书写以及翻译史研究自身问题的理论探索, 或曰翻译史研究的“元 (meta) 研究”。这三个研究层次循序渐进,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和提升。它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图 1.1 所示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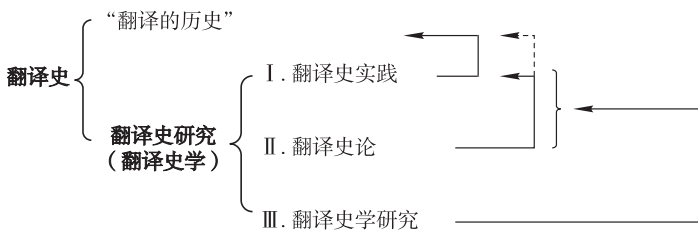


图 1.1 翻译史研究的空间层次

从客体系统的角度来看,翻译史研究则包括众多的专门翻译史研究。我们知道,客体系统由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构成,这三个次级客体又分别包括更次级的相对独立的客体。翻译客体和经济客体、教育客体、文化客体一样,都属于社会客体的次级客体,即客体系统的第三次级客体,但其本身又包含了科学翻译、翻译理论、文学翻译、口译、宗教翻译、翻译文学等四次级客体¹。这样推演,文学翻译史研究就是主体对文学翻译客体的历史认识,科学翻译史研究是主体对科学翻译客体的历史认识,口译史研究则是主体对口译客体的历史认识,等等。显然,翻译史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综合翻译史、文学翻译史、翻译文学史、翻译理论(思想)史、宗教翻译史(如佛经、《圣经》等宗教典籍的翻译史)、民族翻译史、典籍翻译史、科学翻译史、翻译家研究、口译史、性别翻译史、翻译出版史、译者口述史等次级客体的历史研究。同理,第四次级客体又分别包含了許多第五次级客体,第五次级客体又包含了許多第六次级客体……以文学翻译史研究为例,下面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翻译史研究;而戏剧翻译史研究之下又有话剧、歌剧、音乐剧、莎士比亚戏剧等更次级的类型翻译史研究。翻译史研究客体的层级划分如图1.2所示。

随着主体对翻译客体的认识逐步加深,认识本身又构成了新的认识对象,也就是“元(meta)认识”。比如,主体对翻译史研究本身的认识,在空间上表现为“翻译史学研究”,在时间上表现为“翻译史学史”;主体对翻译学本身的认识,在空间上表现为“翻译学研究”,在时间上表现为“翻译学史(或翻译研究史)”。因此,翻译史研究除包含对上述客体的历史研究之外,还有对自身以及翻译学历史的学术探索。也就是说,翻译史学研究和翻译史学史等元研究也属于翻译史研究体系。这样看来,翻译史研究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

1 虽然口译客体与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等客体的范畴有重合部分,但口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可谓一种特殊的翻译客体。学界为了区分口译与笔译,往往将口译单独列出,故本书在这里也将口译客体作为与科学翻译等客体并列的第四次级客体单独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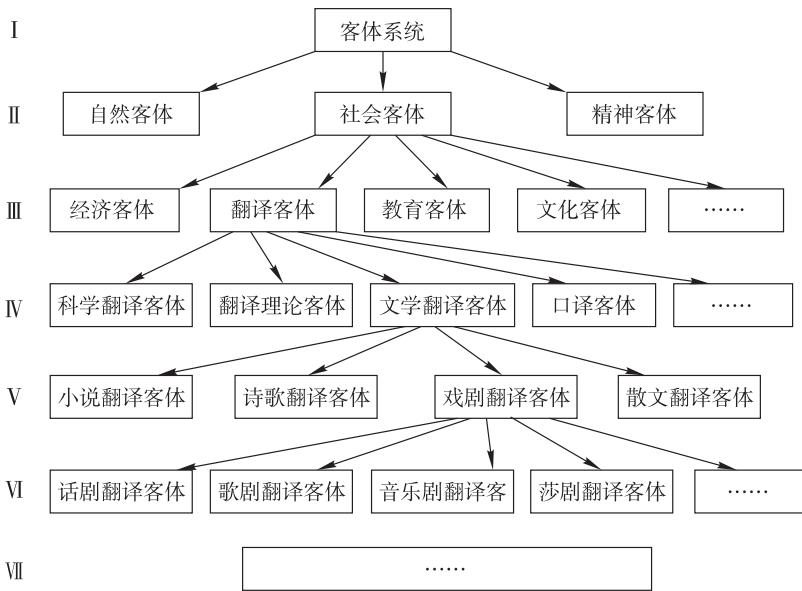


图 1.2 翻译史研究客体层级图

以上主要是从空间角度来看翻译史研究的范围，下面再从时间视角来认识。

时间分为物理时间和历史时间。物理时间是自然的、持续的、没有断裂的时间，而历史时间虽也体现了客体的持续性和顺序性，但不可能没有断裂性。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三种历史时间概念，分别是与环境相关的长时段，与社会经济文化相关的中时段以及具体事件相关的短时段；人类的历史活动分别在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这三个时间层面上都留下了痕迹(费尔南·布罗代尔 1996: 8-10)。就翻译史研究而言，由于物理时间涉及“长久持续的时间单位”上的翻译客体研究，因此它对应翻译通史(指时间维度，不涉及空间的广度与深度)、翻译编年史和翻译纪传史，强调社会结构与翻译客体的环境关联，是一种静态的历史研究；而历史时间的断裂性又造就了断代

翻译史，如按王朝、世纪或历史特定阶段划分的翻译史。当然，人类活动的环境，还对应区域（洲别、国别、省别、民族、文化族群等）翻译通史、断代史、编年史和纪传史；社会时间体现的是社会群体的历史，对应翻译社会文化史，时间长度居于中时段；至于个人时间，体现的是与个人相关的或时间短暂的小规模事件，对应翻译家研究（包括传记）和翻译事件史。

简言之，从空间和时间角度分别来看翻译史研究，会获得不同的认知范畴和研究类型，它们构建了一个宏观而又庞杂的翻译史研究体系。之所以说“庞杂”，是因为翻译史研究的各个分类或分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往往多层次、跨范围交叉，形成一个学术网络。比如，王建开（2003）的著作《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从文学事件的生成因素和读者接受的视角，揭示了英美文学译介的题材和方式与现代中国社会进程的关系，属于翻译史论的范畴，但同时它又是一部中时段的中国英美文学翻译断代史研究作品。

1.3 翻译史研究的三个层次

1.2.3小节提到，翻译史实践、翻译史论和翻译史学研究是翻译史研究循序发展的三个层次。这三者具体分工不尽相同，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与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详见表1.3）。

表 1.3 翻译史研究三层次之比较

类别	研究对象	研究主体	研究成果
翻译史实践	“翻译的历史”（包括译者、原作与译作等）	翻译史家	翻译史料记录、整理与汇编，翻译史描述等
翻译史论	间接对象是“翻译的历史”，直接对象是翻译史实践		翻译史论著述
翻译史学研究	翻译史实践与翻译史论、翻译史家	翻译史学家	翻译史学著述

如果将翻译史实践比作采集建筑材料，那么翻译史论就是运用材料搭造建筑物，而翻译史学研究则是对建筑材料、建筑物、建筑理论和方法的批评与进一步探索。这三个研究层次代表了翻译史研究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paradigm)。

1.3.1 翻译史实践

翻译史实践是翻译史研究的基础层次，主要关涉翻译现象的过程描述，翻译史料的发掘、鉴别、梳理与记载等基础性工作，也就是兰伯特所言的“翻译史料的综合展示”。其研究内容覆盖综合翻译史、文学翻译史、翻译理论(思想)史、宗教翻译史(如佛经、《圣经》等宗教典籍的翻译史)、民族翻译史、典籍翻译史、科学翻译史、口译史、翻译出版史、翻译家口述史、翻译学史(或翻译研究史)等，描述的对象包括翻译活动(精英文化的和大众文化的)、翻译事件、翻译人物(个人或群体)、翻译作品、翻译机构、翻译流派、翻译出版等。简言之，翻译史实践是人们对翻译史实的最基本认识，尽量如实展现翻译史“是什么”，长于对翻译史料的梳爬整理，而疏于对事件的解释和对历史联系的分析。它所产生的“具体史”类型有：

1) 叙述性的翻译史话，如阿英(1938/1981)的《翻译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臧仲伦(1991)的《中国翻译史话》(山东教育出版社)、王晓丹(2012)的《翻译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埃德蒙·加利(Edmond Cary)(1963)的《伟大的法国翻译》(*Les grands traducteurs français*)(Georg & Cie)等；

2) 注重史料发掘和翻译现象历史过程描述的翻译实践史，如马祖毅(2006)主编的《中国翻译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查明建与谢天振(2007)所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劳伦斯·M. 万斯(Laurence M. Vance)(1993)的《英语〈圣经〉翻译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s*)(Vance Publications)等；

3) 发掘与整理历史上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批评话语的翻译理论史, 如陈福康(1992)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芙洛拉·罗斯·艾莫斯(Flora Ross Amos)(1920)的《早期翻译理论》(*Early Theories of Translation*)(Octagon Books)等;

4) 发掘和整理翻译史料的汇编, 如罗新璋(1984)所编的《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黎难秋(1996)所编的《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1997/2006)所编的《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St. Jerome Publishing)等;

5) 记录与描述翻译家的传记和史录, 如王寿兰(1989)主编的《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惠群与乌传充(1992)的《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凯里·H. 康利的(Carey H. Conley)(1927)的《古代经典的早期英语译家》(*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ors of the Classics*)(Yale University Press)、詹妮特·贝尔(Jeanette Beer)(1989)的《中世纪的译者及其技艺》(*Medieval Translators and Their Craft*)(Mediev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等;

6) 记录和描述翻译相关事宜的文献工具书, 包括翻译(译作、译刊、译家、翻译机构等)的年鉴、年表、词典、百科全书、目录、提要、索引等, 如徐宗泽(1949)编著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中国翻译协会编的历年《中国翻译年鉴》(外文出版社)、《中国翻译家辞典》编写组(1988)编写的《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陈善伟(2009)编撰的《中西方翻译纪年: 从远古至2004》(*A Chronolog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Legendary Period to 2004*)(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伊凡斯(H. B. Evans)(1959)的《伏尔泰英译暂定书目》(*A Provisional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Voltaire*)(Institut et Musée Voltaire)等。

翻译史实践作为翻译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当然很重要。近年来翻译史研究逐步兴盛，记录和描述翻译史的著作不断涌现，这一现象说明，随着翻译史家立场和视角的不断变化以及新史料的发掘，翻译史在不断地被重新记录和描述。但在这一过程中，只有那些具有“典型性”的描述才会被引用，并能够继续参与到新的描述中去，而一般的“描述性”作品则逐渐被遗忘（邹振环 2010: 20）。历史过程的残酷性说明，仅有“描述性”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研究还需要研究者树立问题意识，形成一种捕捉对象的独特“视角”。翻译史研究需要抓住“典型性”的对象，通过自己的视角和方法来展现前人的翻译思想、经验和成果。这是一种阐释分析的工作，旨在揭示翻译活动与翻译思想发展变化的成因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探讨的是“为什么翻译”的问题，这构成了翻译史研究的第二层次：翻译史论。

1.3.2 翻译史论

翻译史论是在翻译史实践基础上的提升，指基于史料，运用一定的理论来解释翻译现象，或以论述史，或以史带论，史论相结合，旨在揭示翻译产生、传播和接受的过程及其影响，以透视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历史关联。理论“包含对翻译问题的历史思考”，主要起“探照灯”（searchlight）的作用（Hermans 1999: 34），是研究的切入点。翻译史研究运用的阐释理论既包括翻译理论，也包括从社会学、比较文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等学科领域借鉴而来的理论话语，以及后殖民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学术思想¹。比如，王克非（1997）编著的《翻译文化史论》和美国学者韦努蒂（Laurence Venuti）（1995/2004）所著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就是翻译史论的代表作；前者从文化视角审视了翻译在文化

¹ 当然，鉴于翻译学的跨学科性质，翻译理论本身也借鉴和融入了这些学科的理论话语，如多元系统论、后殖民理论等。

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翻译的制约，后者则结合文化霸权理论对“归化”的流畅翻译策略提出质疑，呼吁以“异化”策略彰显译者身份，以此抵抗英语国家的文化侵略。概括来讲，翻译史论表达了翻译史家的见解和判断，重点在“史识”，而不再是“史料”和“考证”，因而要防止大量的情节复述和事件介绍淹没“史识”。

应该说，翻译史研究的前两个层次都是对翻译活动的历史认识，都属于翻译史研究的实践性工作，不同之处在于翻译史实践是对翻译史的考察性认识，而翻译史论是对翻译史的价值性认识，前者为后者提供研究资料。翻译史实践重在对史料的发掘，强调史料的“全”与科学的“真”，尽力展现翻译史的客观面貌；而翻译史论重在对史料的阐释，强调对史料“粗中取精”，选择代表性的史料检验研究假设，以说明翻译现象或翻译史的发展规律，揭示翻译史实的成因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比如，对于英使乔治·马夏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事件（1792至1794年）中的翻译问题，季压西、陈伟民（2007）所著的《中国近代通事》凭借专著的篇幅优势，专门在第一章以翔实的史料描述了中英早期交往中的语言障碍问题，指出外语人才匮乏是关键因素。与此初步分析不同，王辉（2009）的论文《天朝话语与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书的清宫译文》与王宏志（2013）的论文《大红毛国的来信：马夏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则主要从国书翻译出发，分别从一定的理论视角阐释了翻译的运作。王辉分析，英国国书翻译成了向乾隆敬呈的表文，是天朝话语运作的必然结果；王宏志则认为，中英不同的政治制度与外交文化观念制约了翻译，因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中译文本。可见，《中国近代通事》主要关注翻译史实践，而王辉和王宏志从事的是翻译史论工作。当然，由于研究者的主体性或研究语境变化等因素，翻译史论会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视角和多样性的结论，王辉和王宏志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结论互为补充，从而构建出相对完整的历史真相。不过有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比如，孔慧怡（2005：75-86）通过大量的文献分析和资料发掘，提出鸠摩罗什而非人们

普遍认可的玄奘才是中国最有影响力和最出色的佛经翻译家，从而否定了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其实，研究结论之所以大相径庭，问题还在于大多数研究人员前期所开展的翻译史实践工作不扎实，以致出现论述错误。可见，翻译史实践和翻译史论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彼此孤立的两个层次。翻译史实践努力追求史料的“真”，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受研究者主体思想意识的制约；翻译史论旨在对翻译现象进行阐释，但也不能失却对翻译史实的辨伪和进一步发掘，王宏志的上述文章就体现了这一特色。所以说，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

简言之，翻译史实践和翻译史论都是以客观翻译史为对象进行的研究，前者尽量如实展现翻译史有什么，后者极力探索为什么翻译，探究历史上翻译活动的动因、目的与影响。虽然二者分属于描述与解释两个不同的层面，但实际上回答的都是“翻译史是什么”的翻译史本体问题，属于思辨的翻译史哲学范畴。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史论从结构理论向社会学、文化学、后结构与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嬗变，反映了翻译史本体论的发展。

1.3.3 翻译史学研究

翻译史研究的第三个层次是翻译史学研究，是对翻译史的书写、结构、术语，翻译史理论和翻译史学自身问题的理论探索，以翻译史实践和翻译史论两个实践层面为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反思和进一步指导，可以说是完善翻译史研究的“元研究”。具体地说，翻译史学研究的内容包括：

1) 对翻译史研究过程的理论探讨，即对如何研究翻译史和为什么要这样研究翻译史的理论探讨，也就是对翻译史研究前两个层次的批评与理论探索，涉及翻译史料学、翻译史书写模式研究、翻译史书写者的认知结构考察、翻译史著述的论证结构分析、翻译史的元语言研究(对书写翻译史的语言话语的批评研究)、翻译史阐释理论探讨(对以往的翻译史论作批评，探讨用什么样的理论话语和框架来解释翻译史实)，以及对翻译家与

翻译作品的评价理论、翻译史批评理论、翻译史的定义描述、翻译史的类型与特征、翻译史的目的与范围、翻译史的分期理论、翻译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辩证过程等问题。

2) 对翻译史研究本身的理论探索, 涉及翻译史研究的术语与原理、翻译史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翻译史学史、翻译史学的价值与功能、翻译史学的认知范畴等方面。

可见, 翻译史学研究回答“怎样认识翻译史”的问题, 是翻译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思考, 它既是翻译史研究的最高形态, 又是考察翻译史的总体指导思想和最根本的方法论。此外, 翻译史研究方法还是翻译史学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延伸, 既探讨翻译史的编撰方法与理论, 也探讨翻译史研究本身的方法论; 既探讨普遍方法(如唯物辩证方法、实事求是的史论结合方法等), 也探讨专门方法(如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计量研究法、心理研究法等); 既探讨一般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宏观与微观等), 也探讨具体语境下的特殊方法(如语料库研究法、文本比照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等)。本书的第四章将专门探讨跨学科的翻译史研究方法。

迄今, 翻译史学研究方面的著述尚不多见。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 除散见于学术期刊和翻译学专著的部分章节外, 重要的著作有皮姆(Pym 1998/2007)的《翻译史研究方法》、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2001)主编的《巴西翻译史研究新观点》(*Emerging Views on Translation History in Brazil*)以及巴斯坦与班迪亚(Bastin & Bandia 2006)共同主编的文集《勾画翻译史的未来》(*Charting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History*)¹, 这些著述在翻译史书写、翻译史理论、翻译史学理论、翻译史学史、翻译史学科自身等方

1 即便是弥尔顿、巴斯坦与班迪亚的史著, 也是翻译史论与翻译史学研究并存的著作, 其大体结构是: 前半部分探讨翻译史学理论, 后半部分结合史学理论探讨翻译史现象。当然, 也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史论著和翻译学著作的章节包含了若干史学理论的探讨, 如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1980/1991/2010)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就论及了翻译史分期理论等。

面都有深入的探讨与反思。此外,《媒他》(*Meta*)、《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译者》(*The Translator*)等翻译研究学术期刊都曾开辟翻译史研究专刊,专门探讨翻译史理论与方法(本书2.2.3节将专门论述)。在国内,邹振环(2017)所著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对百年中国翻译史学进行了纵横描述、批评与反思,应是中国翻译史学研究的开山之著¹,而其他的论述也主要散见于学术期刊、翻译史著或翻译学著作的部分章节。

由上可见,翻译史学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不同于翻译史研究的前两个层次。翻译史实践和翻译史论的研究主体都是翻译史家,客体都是历史上的翻译现象,而翻译史学研究的主体是翻译史学家,客体是翻译史研究自身。这种从对客观翻译史的研究转移到对翻译史认识主体(即对翻译史家)上来的研究,属于分析/批判的翻译史哲学范畴。从皮姆和巴斯坦等人的著述来看,翻译史认识论经历了从客观主义到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发展,而当下的翻译史方法论也日趋多元化,既融合了传统的“移情方法”(empathetic method,即对精心考证的翻译史料进行推演,进而描述精英翻译家和翻译史大事件)与技术成分较高的实证归纳与分析法,也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方法。

简言之,翻译史学研究是对翻译史研究本身的认知和探索,旨在促进翻译史研究的发展,构建其学科身份。在这种意义上,翻译史学研究显然是翻译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它的必要前提条件或“前导”(prolegomena),因为翻译史研究必须通过自我反思与批判来认识自身。若没有这一必要的前导,翻译史研究体系必不完整,更谈不上科学。

1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获悉谭载喜教授的新著《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已于2021年9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该书旨在梳理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学术成果,应该是中国对西方翻译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最早史作。

1.4 翻译史研究的两种类型：内史与外史

“内史”与“外史”是历史学中的一对研究模式，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1981: 108-113)提出的，他将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史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与科学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内史关注科学知识的增长与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阐述等，关心科学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逻辑关系；而外史把科学家视为一个大的文化范围中的社会群体，在关注他们的活动的同时也考察影响和制约科学知识增长的历史、社会、文化及心理因素，亦即把科学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

若将这一对方法运用于翻译史研究，那么所谓的内史就指：(1)从翻译自身的角度(语言转换角度)来探讨翻译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概念、框架、方法和理论，并阐述理论与翻译自身的关系；(2)剖析翻译史实在历史中的前后逻辑关系。英国翻译学者路易斯·G·凯利(Louis G. Kelly)(1979)的《真正的阐释者：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史》(*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运用翻译与语言转换理论的关系来探讨西方翻译史实践和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是一部典型的翻译内史著作，属于内史研究的第一种类型。翻译史实是翻译史的内部核心因素。翻译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翻译史实(包括翻译家生平、翻译家翻译思想/理论、翻译作品、译作目录与索引、译本版本、翻译风格、翻译团体、翻译派别、翻译机构、翻译政策等)的发掘、考证与整理，以及对史实产生机制的研究。第二类内史研究的典型例子包括：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译作的比较分析，观察翻译风格的历史变化与译者(们)翻译思想的变迁；通过原本与多个译本的比较，考察翻译方法与翻译风格的变化；通过考证译本的版本与印数，考察翻译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翻译的接受和影响；等等。内史研究是翻译史研究自身存在的基石，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构成物质，换言之，内史研究是翻译史研究的基础

和起点。一般来说，翻译史研究第一个层次(翻译史实践)的绝大多数研究，以及第二个层次(翻译史论)中从语言和心理等角度解释翻译现象历史变化的研究(实际上，纯粹的此类翻译史研究比较少)都属于内史研究范畴。

不过，内史研究仅从翻译与语言的角度论述翻译的历史发展和翻译史实的前后因果，忽视了外部环境对翻译的影响；而外史研究则把翻译活动纳入一个更大的文化范围中来考察，“重点注意寻找影响或决定翻译演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邹振环 2010: 21)。比如，通过对译本的印数考证，来描述当时翻译活动开展的情况，或描述某部外国作品在目标语国的接受与传播情况，这是典型的内部研究方法；但如果拔高一个层次，探寻开展翻译活动或决定译本接受与传播的社会条件与文化语境，便不仅能拓宽翻译史研究的领域，还能提升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完善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帮助我们获得接近真实和完整的认知。翻译史研究第二个层次中，从时空上的纵向、横向关系探寻翻译活动演变条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解释翻译现象的历史变化的研究，都属于外史研究。因此，外史研究要求翻译史研究者不能局限于翻译史的范围，还要进入到社会史、科学史、文化史等相关的知识领域中。这种艰苦的结合，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打通内史与外史之间的壁垒，形成一种统一的翻译史；更在于在这种新的范式下，翻译史研究能够大大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对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诠释。此外，这还是改善目前中国翻译史研究状况的一个必要途径。

1.5 小结

“翻译史”指人类过去的翻译经历，是抽象的客观历史存在，而“翻译史研究”(或曰“翻译史学”)是人们对翻译史的认识，前者为后者的知

识体系构建提供准备。本章首先厘清了翻译史研究之“名”，使我们认识到，翻译史研究既是以翻译为对象的专门史，也是跨历史学和翻译学的学科史，与历史学和翻译学紧密关联。换言之，历史学与翻译学是翻译史研究的支撑学科，历史学主要为翻译史研究提供学科框架与方法论，而翻译学主要为其提供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借助德赫斯特所勾勒的历史研究范畴，可将翻译史研究在空间上划分为翻译史实践、翻译史论和翻译史学研究三个层次：翻译史实践是对人类社会翻译活动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的历史描述；翻译史论是以理论为指导对翻译史资料的系统分析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认识和理解；翻译史学研究则是对前两者的理解或诠释，即对翻译史理论和翻译史研究自身问题的理论探索。这三个研究层次循序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和提升。此外，翻译史研究的三层次在空间上又衍生出层级式的主题史，层级越低，主题越具体；在时间上则决定了翻译史的结构。

翻译史研究的三个层次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笔者考察中西方的翻译史研究发现，虽然翻译史研究的内容覆盖面很广，但多侧重于对文学翻译、宗教翻译和翻译思想/理论的历史叙述，长于对具体译史和译论的梳理与总结，编年体例的资料汇编，以及译家、译事或译作的个案研究，缺少从史学角度、运用史学研究方法深入研究翻译史的力作，更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St André 2009: 134-136；王宏志 1999: 58；许钧、穆雷 2009b: 205）。换言之，翻译史研究呈现出颇不平衡的研究态势：翻译史实践取得了长足进展（当然，其内部也存在研究态势不均衡和资讯、视角等方面的问题）；翻译史论一度比较薄弱，以史带论或以论释史的史论结合研究差强人意，但近年来上升势头很快，已占据翻译史研究的主流；而以翻译史书写模式、研究方法和史学自身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翻译史学研究目前来看最为薄弱。

翻译史研究态势的不均衡，反映了翻译史学理论的欠缺。不过，随着皮姆等一班学者的努力，翻译史研究有望摆脱仅注重史料梳爬和翻译精英

叙述的传统史学桎梏，走向注重文化建构的新文化史学和反权威、反中心的后现代史学；既从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多个角度审视翻译史和研究翻译现象，加强翻译史论的阐释力，又不断完善翻译史学科的建设。当然，在研究态势的纠枉过程中，也不能因噎废食，忽视对翻译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总结。唯有如此，翻译史研究才能在各个层次上取得均衡健康的发展。